



林思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所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研究報告系列

第八十八期
二零零九年六月

大陸媒體績效考核制度下新聞專業的實踐邏輯：
國家 – 市場之外的視角

夏倩芳 尹瑛
武漢大學

本文作者歡迎讀者提供意見。

聯絡方法：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夏倩芳
電郵：xiaqf2005@126.com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is an endeavour of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a consortium with 28 member universities, to foster dialogue amo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ast-West studies. Globalisation has multiplied and accelerated inter-cultural, inter-ethnic, and inter-religious encounters, intentionally or not. In a world where time and place are increasingly compressed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grows in density, numbers, and spread, East-West studies has gained a renewed mandate. LEWI's Working Paper Series provides a forum for the speedy and informal exchange of ideas, as scholar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ttempt to grapple with issues of an inter-cultural and global nature.

Circulation of this series is free of charge. Comments should be addressed directly to authors. Abstracts of paper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LEWI web page at <http://www.hkbu.edu.hk/~lewi/publications.html>.

Manuscript Submission: Scholars in East-West studies at member universiti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ubmitting a paper for publication should send an article manuscript, preferably in a Word file via e-mail, as well as a submission form (available online) to the Series Secretary at the address below. The preferred type is Times New Roman, not less than 11 point.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will review all submissions. The Institute reserves the right not to publish particular manuscripts submitted. Authors should hear from the Series Secretary about the review results normally within one month after submission.

Copyright: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copyright remains with the author. Please do not cite or circulate the paper without the author's consent.

Editors: Ah Chung TSOI, Director of LEWI; Emilie Yueh-yu YEH, Cinema & TV and Associate Director of LEWI.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From HKBU: CHEN Ling, Communication Studies; Martha CHEUNG,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ivienne LUK, Management; Eva MAN, Humanities; TING Wai,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ONG Man Kong, History; Terry YIP,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om outside HKBU: David HAYWARD, Social Economics and Housing,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Disclaimer: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and its officers, representatives, and staff, expressly disclaim any and all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for the opinions expressed, or for any error or omission present, in any of the papers within the Working Paper Series. All opinions, errors, omissions and such are sole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hor. Authors must conform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use of non-published and published materials, citations, and bibliography, and ar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any such errors.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king paper serie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Series Secretary:**

David C. Lam Institute for East-West Studies (LEW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owloon Tong
Hong Kong
Tel: (852) 3411-7273; Fax: (852) 3411-5128
E-mail: lewi@hkbu.edu.hk
Website: <http://www.hkbu.edu.hk/~lewi/institute.html>

大陸媒體績效考核制度下新聞專業主義的實踐邏輯：國家—市場之外的視角

夏倩芳 尹瑛

武漢大學

內容提要

本研究以深度訪談法考察了在組織-專業衝突下，新聞從業者專業主義追求的實踐邏輯。研究發現，在現行新聞體制提供的專業主義實踐空間中，績效考核制度作為直接關涉從業者個體利益的組織控制手段直接決定著從業者追求專業主義實踐空間的維度。因此，作者提出，在有限的體制空間內通過完善組織制度來最大限度地保障從業者的專業主義實踐，應是目前的最佳選擇，而這些組織制度不僅包括本研究中所討論的績效考核制度，還包括內部新聞評獎、人才提拔、崗位規劃等與從業者利益息息相關的各項組織制度，只有在組織制度層面對從業者的專業主義實踐予以有效保障方有可能使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與規範落實到具體實踐層面，並通過從業者實踐中主動性的發揮不斷開拓現行體制下新聞專業主義實踐的現實空間。

關鍵字：績效考核，專業主義，新聞常規，專業認同，報導風險

前言

雖然新聞專業主義尚未成為中國新聞實踐中社會和權力關係的模式(潘，陸，2002)，但是對中國新聞改革的考察，依然不能離開新聞專業主義這一核心及判准。現有相關研究多強調大陸“黨國控制”的體制基礎不變的情況下，國家和市場力量對專業主義實踐空間的滲透與擠壓，以及新聞專業主義本身作為一種價值理念對從業者微觀新聞實踐的解放作用(潘忠黨，1997a,1997b,1997c；潘忠黨、陳韜文，2005)。陸曄、潘忠黨(2002)對中國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話語建構的研究將改革過程中從業者專業主義實踐所處的張力空間描繪為體制內外、行業內外和組織內外三重互動空間，揭示出現實體制下從業者新聞專業主義實踐碎片化和局域化的特徵。而研究者對我國媒體新聞生產過程中的權力實踐的研究雖然關注的也是新聞改革下我國媒體內部“微小的新聞實踐”特徵，但其中所描述的多是流動於國家、

市場與媒體之間、媒體從業者與外部社會資源網路間各種權力關係(陸曄, 2005), 少有研究從個體-組織的視角和新聞人群體的利益角度來考察組織內部制度對新聞專業主義微觀實踐的影響。而以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看來, 具有結構性特徵的各種制度形式與日常生活常規之間的構成過程是相互介入的, 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徵既是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的仲介, 也是它的結果(Giddens, 1984/李康、李猛譯, 1998); 對大陸媒體而言, 國家和市場固然是對新聞專業主義的重要的結構性宰製力量, 對日常新聞實踐有著重要影響, 但媒體組織的內部制度亦是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素, 這些制度因素與日常新聞實踐之間彼此互動, 相互介入, 共同決定著從業者新聞專業主義的實踐邏輯。

有關新聞媒介的組織機制對新聞生產影響的研究不乏經典之作。Breed (1955) 對新聞編輯室的社會控制的研究發現, 儘管理想地說, 民主社會中報紙不當面臨“控制”或“政策”問題, 但實際觀察顯示, 出版者不僅確實定有政策, 而且這些政策中不乏有違新聞規範的; 雖然從業者常常不認同它們, 但在工作中卻會將政策內化以使自己與組織保持一致以獲得報酬並避免懲罰。而 Sigelman (1973) 對新聞報導的組織分析也指出: “彌散的社會化過程維護了自由報導的神話”。在他看來, 報紙的偏見是“組織過程特殊的混合物”, 為避免報導者與管理者之間的衝突而建構的一系列組織程式是新聞偏見產生的原因, 其中, 金錢是重要的組織規制手段之一。儘管兩位元研究者均未對組織的利益分配機制進行相關論述, 但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報酬、金錢會對從業者行為造成影響。

此外, 還有很多關於新聞職業群體的研究亦涉及組織內部利益分配制度對新聞生產的影響。不少研究亦指出, 名記者在組織中具有更多的自主權, 其行為更不受組織制度的干預(Breed, 1955; Sigelman, 1973; 林富美, 2004, 2006; 陸曄、潘忠黨, 2002), 年輕記者渴望獲得成就, 並會為此而小心遵從組織標準以免因製造麻煩而影響升遷

(Breed, 1955)。林富美(2006)對臺灣成名記者的研究則進一步指出，實際上，“名聲”原本就是從業者重要的勞動資產，直接影響勞動報酬與工作機會，一旦從業者關注焦點變為自身利益而非社會的共同進步，那麼名聲等象徵資本就因為被商品化而對新聞專業勞動產生影響；在此過程中，從業者往往為累積名聲而去迎合媒體組織的產制要求與管理規範，使得記者以名聲為基礎的勞動特質反倒成為形塑新聞專業勞動商品化的有利機制。

而媒體績效考核制度恰恰是通過利益分配杠杆對員工行為進行有效管理的組織制度，這種利益分配不僅僅包括物質利益，同時也包括工作機會、升遷機會和各種榮譽等非物質利益的分配，體現的是組織內部制度對從業者個體的影響。林富美(1997)對臺灣聯合報系的薪酬策略的研究就發現，聯合報的薪酬策略在發揮人才留用與激勵作用的同時亦深刻影響著其員工的新聞價值判斷、採訪互動與個體成就需求。而對大陸績效考核制度的相關研究或單面強調考核的激勵作用與組織導向功能（尹連根，2002，2003a，2003b，2004；陳柏健，2006；劉冰、趙傑、胡凱，2007；王亞明，2005），或簡單假定量化考核必然導致從業者專業理想的喪失（禹建強，2005；馬藝、殷莉，2005；張辛、李強，2006），均缺乏對該制度影響下從業者具體的微觀實踐的細緻考察。本研究則正是試圖通過考察該制度下從業者的微觀實踐，從個體-組織視角來描繪直接作用於個體利益分配的組織內部制度對從業者個體行為的影響以及在該影響下的新聞專業主義實踐邏輯。

績效考核制度是大陸媒體市場化進程的組成部分，是“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的具體實施，市場經濟理念對原有的“事業單位”管理機制的進入。其宗旨是打破“大鍋飯”制度，通過業績和利益掛鉤來調動從業者的工作熱情，這樣也在管理手段上進一步達到通過“管人”以“管事”的一貫的編輯室控制目的。2000年以後，這種制度在大陸媒體中普及。

績效考核制度是轉型期中國的獨特現象。西方國家、日本、香港等地對記者不實行這種考核。他們一般實行年薪制，側重于對員工行為的考核。英國的報業在考評時，部門主任會與員工挨個談話，考核重點放在如何提高工作及設定未來工作目標。美國的報業大多也沒有對記者發稿數量的規定，記者的工作表現有很多回饋的管道，如與其他記者的比較，稿件的回饋等（唐芬豔，2007）。這與大陸報業所普遍實行的計工分式的績效考核方式截然不同。

而結合 Breed(1955)所謂的“編輯室內控制”與 Sigleman(1973)所謂的“精細的組織控制結構和流程”來看，大陸媒體的績效考核制度或正是大陸媒體獨特的編輯室內控制或組織內部控制手段，借助這種手段，來自組織外部的國家與市場控制力量被轉換為組織內部的利益控制機制；同時，從業者在組織內被社會化的過程也就包含著績效考核標準的內化，借助這種內化，組織控制轉換為從業者個體的控制，使組織內部的新聞生產活動以有序的方式進行。

然而，作為組織管理手段的績效考核，其與從業者的專業實踐之間的潛在矛盾就在於：儘管從業者在個體層面接受了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新聞模式（Chan & Pan, 2004），媒介市場化亦為新聞專業主義的實踐提供了一定的現實空間；但在媒介組織層面，“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的媒介屬性使媒介組織在新聞生產活動中面臨著難以回避的現實困境：媒體既要服從黨的領導又要遵從市場規律，新聞專業主義所賴以存在的政治、經濟和行業間的制度原則亦無法統一（陸曄、潘忠黨，2002），表現在績效考核制度上則是部分考核標準的非專業主義取向（例如有的考核強調稿件的“意識形態”標準，有的強調“市場取向”），由此形成了組織-專業間的內在衝突，而這種組織-專業的衝突實際也就是有著專業主義追求的從業者個體與被國家-市場控制所捆綁著的組織之間的衝突；與此同時，由於既定體制所形塑的新聞專業主義實踐空間本身具有一定的彈性，不同績效考核制度是否通過影響從業者直接的

個體利益而關涉到從業者追求專業主義實踐空間的維度？該制度對新聞從業者的新聞實踐邏輯究竟有何影響？這不僅是理解新聞改革所帶來的媒體變革時必須考察的內容；同時也為我們在國家-市場視角之外解答新聞專業主義的話語實踐在中國為何難以成為常規實踐這一至關重要的理論問題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考方向。

一、大陸媒體的內部分配制度改革

大陸媒體從 1979 年起進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改革，改革的初衷是既擺脫媒體在經濟上對政府撥款的依賴，減輕政府壓力，同時又不放鬆對媒體意識形態的控制。因此改革的路徑首先從與意識形態關聯不緊密的經營分配制度上開始，再到編采運作制度和宏觀管理制度層面（陳懷林，2000），其中就暗含著通過分配制度改革激勵個體，引發個體行為變化，繼而推動組織變革的行為邏輯。從媒體內部分配制度看，大陸媒體在進入市場化之前，其收入主要來源於政黨津貼，員工報酬也以基本工資為主，加上福利分房、醫療保險和若干“大鍋飯”的花紅，工資高低則取決於員工所屬報紙的行政級別以及自己的專業職稱。進入 90 年代，尤其是 1994 年以後，廣告和其他市場活動逐漸成為媒體收入的主要來源，而政府為鼓勵媒體爭取市場收入也允許它們自行支配部分利潤，媒體經濟自主的空間擴大，一些市場化較為成功的媒體，其從業者的收入也不再主要依賴於基本工資，而更多依賴於稿酬、獎金等收入；媒體自身的行政級別也不再是影響從業者收入的關鍵因素，取而代之的是媒體自身的市場化情況。（李金銓，2004）

就大陸媒體目前的內部收入分配情況而言，多數從業者目前收入的主要構成為“基礎工資+計件工資+職務津貼+年終獎”，其中，基礎工資相對固定，主要還是與從業者的被評聘的級別或在報社中的崗位相關，行業內俗稱“底薪”。職務津貼則是媒體內擁有一官半職的人才能享有的待遇；年終獎則視媒體當年贏利情況和從業

者當年整體工作表現發放。計件工資部分則直接與工作量和工作完成情況掛鉤。基礎工資和職務津貼在大多數媒體裏僅占個人收入的很小部分，計件工資和年終獎金稱爲績效工資，是決定收入差距的關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很多新聞業者將自己的工作稱爲“掙工分”，那些在九十年代末以後進入媒體的，檔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不享受分房等事業單位福利的新聞員工，更是稱自己爲“新聞民工”。

20 世紀 90 年代，尤其是 1992 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大陸媒體被政府推向市場，財政撥款、公費訂閱等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媒體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被逐步削弱（參見李金銓，2004），“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成爲絕大多數媒體必須正視的生存問題，這使習慣了計劃經濟體制下運作的媒體切身體會到了市場競爭的意義。如何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創造性使媒體更好地適應市場成爲了媒體思考的問題，內部激勵機制的建立也被提上了日程。這時已經爲大陸其他企業所普遍採用的績效考核制度也開始受到媒體的關注，一些較早“斷奶”進入市場化階段的行業報和都市報開始採用績效考核的方式來激勵員工行爲。後來，隨著都市報影響力的不斷擴散，其他報紙包括各地黨政機關報及晚報等竟相仿效，約在 2000 年前後逐步建立起這種以量化考核和計件爲基本特徵的工資體制。¹

目前，大陸多數媒體都已實行績效考核制度，基本上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做法，但真正制度化、規範化的不多，不少媒體沒有成文的績效考核規則與條例，評價具有較強的主觀性；但整體來看，規範有效的績效考核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很快，其對媒介整體績效的提升效果也較明顯。（肖燕雄，2008）

從組織角度來說，績效考核制度作爲薪酬管理的方式主要是爲了正面激勵員工、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杜旌，2005；林富美，1997）。它同時也作爲組織的一種控制工具，向員工提供的回饋是管理者對於員工工作行爲可能採取的獎懲策略，對員工行爲具有導向作用（杜旌，2005）。考核給員工提供的回饋不僅影響他們對未來工作目

標的設定，更會直接影響其具體行為方式，他們會強化受到考核獎勵的行為、弱化考核懲罰的行為（戴斯勒/呂延傑、趙欣豔譯，2004），由此影響到他們下一輪實踐中對自己既往行為的選擇與評價，引發行為方式的改變。因此，績效考核也成為媒體內部重要的控制策略。這就解釋了為何不少媒體在組織目標調整的同時往往伴隨著績效考核制度的修訂。例如，南方日報在 2002 年 8 月報紙改版時全面引入績效考核制度，該制度對員工的激勵作用對保障改版的順利進行發揮了重要作用（尹連根，2002，2003a）；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在央視 2002 年底提出“收視率末位淘汰制”後將欄目的定位從過去強調人文性故事調整為以調查性報導為核心產品，欄目製片人張潔在對調整思路後引發的爭議進行分析時認為，既往節目定位下從業者的“慣性”使他們不願意進行調整，因為調整前從業者通常是在“善意而非對抗的過程中採訪”；而調整意味著他們將更多地面對對抗性的採訪。為迅速實現從業者報導常規的調整，他們根據戰略重新設計了績效考核體系，將觀眾的關注度、節目的影響力、新聞的獨家性、創新性以及節目對抗程度的強弱等都納入考核標準當中。²林富美(1997)對臺灣聯合報系的薪酬策略的研究也發現，組織的薪酬策略往往具有績效化作用，將新聞生產“績效化”，使從業者在新聞判斷標準上迎合組織發稿標準。這些研究實際上顯示出，績效考核制度與 Breed(1955)、Sigleman (1973) 所描繪的組織內部不成文的種種社會化機制一樣，是組織對新聞生產活動實施干預的隱性控制機制，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從業者的專業主義實踐。而從媒體控制角度的來看，績效考核制度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指令媒介 (command media)”（李金銓，2004：76）的控制方式又顯然不同，一方面，它不同於“指令媒介”下將媒體作為“黨的喉舌”直接施以意識形態強制的控制方式，它是媒體為應對市場競爭，調控從業者行為而採取的組織控制策略；另一方面，它亦不同於其他帶有強制性的組織內部控制制度，它直接作用於從業者個體，以利益分配為誘餌促使從業者主動

調整個體行為以迎合組織新聞生產需求，故而有別於既往的組織控制策略。

但目前對大陸媒體績效考核制度的研究並未關注此問題，從管理者角度出發的研究多認為績效考核制度激勵了從業者的工作熱情，提升了組織的整體績效，忽視了被考核者對制度的理解、評價及其相應的行為改變（尹連根，2002，2003a，2003b，2004；陳柏健，2006；劉冰、趙傑、胡凱，2007；王亞明，2005）；而其他業界或學界人士的研究則多持批判立場，在量化考核與從業者專業理想的抹殺之間建立簡單因果關係，忽略了從業者作為實踐主體的主動性（禹建強，2005；馬藝、殷莉，2005；張辛、李強，2006）。我們認為，儘管績效考核直接關涉個體切身利益，必然對從業者行為選擇造成影響，但對於作為專業人士的新聞從業者而言，出於自我專業價值實現的需求，其行為選擇又絕非簡單的利益邏輯所能解釋，不能簡單假定量化考核必然導致從業者專業理想的抹殺，他們作為具有主動性的實踐主體往往能在實踐場域中依據具體的情境採取不同的實踐策略來實現自我的專業價值，表現出靈活的新聞實踐邏輯，為此，本研究所關注的正是在個體-組織層面上，這種靈活的新聞實踐邏輯與新聞專業主義間的契合與背離，以及導致這種契合與背離發生的具體原因與作用機制。

二、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策略

本研究以大陸媒體績效考核制度下從業者的實踐活動為研究物件，探討在個體-組織層面上，新聞專業主義實踐的影響機制及其邏輯。由於考核對從業者行為動機及其所採取的影響難以在日常新聞生產實踐中被觀察到，因此本研究主要採用深度訪談方式採集資料。以對訪談資料和相關文獻資料的分析，配合相關人士提供的一般性觀察作為輔助論證資料為研究策略。通過資料搜集上的“三角互證”來盡可能減少單一深度訪談策略所帶來的研究中的主觀傾向，同時，這種資料搜集活動又不是由

研究設計到資料搜集再到意義闡釋的簡單線性過程，而是一個循環往復、相互推動的互動過程。(馬克斯威爾著/朱光明譯，2007)

研究期間共訪談了 51 位新聞從業者³，其中 47 位為面訪，另有 4 位元通過電話、QQ、MSN 進行的訪談。考慮到媒體之間的考核方式有明顯差異，本研究要討論的是考核方式對新聞人員實踐的影響，因此資料搜集盡可能地覆蓋各種不同類型的考核媒體。同時，因為不同職稱、職務的人對考核的感受不同，我們在樣本選取時依據地域、考核方式差異、新聞資歷和職務這三個因素選擇受訪者。51 位受訪者主要分佈在武漢、廣州、深圳、上海、北京、杭州、蘇州、南昌、合肥、太原等城市的 27 家新聞媒體當中，其中包括黨報黨台 12 家，市場類媒體 15 家。受訪者中新聞資歷 10 年(含 10 年)以上的共有 21 位，5 至 10 年的 12 位，5 年以下(含 5 年)的 18 位；其中 18 位為媒體中層或中層以上管理者，其他為普通記者編輯。所有訪談在 2008 年 3 月-11 月，2009 年 4 月-5 月進行，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為 1 至 6 小時不等，其中重點訪談對象的訪談分多次完成。訪談資料多為根據錄音完整轉錄，部分受訪者不同意採用錄音記錄的情況下則採用快速筆錄的方式記錄。訪談採用無結構訪談方式，主要圍繞績效考核對從業者日常實踐的具體影響展開。

配合深度訪談為主的研究策略，本文在將訪談資料與文獻資料進行歸納和對照後，選取訪談資料中具有代表性的描述，融合我們對問題的反思及相關文獻和一般性觀察資料的分析，來描述我們所觀察到的績效考核制度下從業者的新聞實踐邏輯。同時，由於本研究涉及到受訪者對自身所在媒體的評論，為避免受訪者的身份被識別，遵守我們對受訪者的訪談承諾，文中將隱匿受訪者身份。

三、資料分析

新聞業作為專業，它與其他行業區分開來的惟一標準在於“自主性的事實”(the

fact of autonomy) (劉思達, 2006), 從業者的專業自主不僅是實踐新聞專業主義的必要條件, 同時也是評估從業者是否為專業人士的重要指標之一(林淳華, 1996)。因此, 媒介組織對自主性的干預往往允許他們的新聞操作以自主的形式出現, 但“在暗地裏卻對它進行間接的、難以讓人察覺的社會控制”(Gitlin, 1980/張銳譯, 2007: 194)。績效考核制度正是這種暗地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於不同媒體所採取的績效考核制度在考核標準和考核方式上存在差異, 從業者實踐新聞專業主義所能獲得的回報以及為實踐新聞專業主義而採取的部分“違規”策略所可能付出的代價亦有別。或者說, 不同績效考核制度為新聞專業主義實踐所提供的組織制度空間不同。為此, 在整個研究過程中, 我們首先關注的是績效考核對從業者實踐行為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這種影響又是如何發生的, 目的在於通過考察績效考核制度下新聞人的日常行為邏輯, 探索新聞專業主義的宏觀控制力量——國家、市場因素是如何在微觀的個體-組織層面、在日常的新聞生產過程中彌散、交錯或扭曲的。

(一) 個體新聞實踐與組織新聞常規的互動

新聞常規作為媒介組織“模式化的、常規化的、重複進行的實踐形式”(Shoemaker, 1996/張詠華注釋, 2007: 75), 強調的是媒介組織的“慣性(inertia)”, 是新聞機構最通常的習慣(Gitlin, 1980/張銳譯, 2007)。從組織角度出發, 新聞常規使新聞生產活動具有可預期性和可控制性, 保證了媒介機構的有序運作(Breed, 1955; Roshco, 1975/薑雪影譯, 1994); 而從從業者個體出發, 新聞常規為他們提供了一套快速有效地篩選、分類和判斷事實的方法, 使他們能夠有效應付每天變化萬千的複雜世界, 順利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Tuchman, 1972, 1974; Tuchman, 1978/麻爭旗等譯, 2008; Gitlin, 1980/張銳譯, 2007; 李普曼/閻克文等

譯,2002)。這套常規通常以媒介組織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興趣為基礎 (Gitlin,1980/張銳譯,2007),通過組織試錯性學習過程中不斷的經驗總結來形成。簡而言之,新聞常規包括媒介組織層面相對穩定的組織結構和管理程式以及個體層面持有的幫助他們迅速認識、分類和理解新聞事件的既定概念 (潘忠黨,1997b)。它是新聞媒體習慣性遵循的生產標準,能夠幫助從業者更方便、更迅速地生產新聞,但同時也成為限制新聞生產的框架。

新聞常規實際上類似於組織理論中的組織慣例。自從 Stene (1940)引入慣例概念,慣例已被認為是組織的重要特徵和企業完成任務的主要手段,對組織行為有重要影響,是人類組織的核心特徵和解釋性機制 (Feldman & Pentland,2003)。組織慣例可以被理解為是組織為保障生產的有序進行而採用的重複的活動方式,但其具體執行依賴于組織成員個體。由於組織慣例本身包含著不可言說的知識與技巧成分,組織成員對這些知識與技巧的掌握與領悟程度也就影響著他們執行組織慣例的水準 (Nelson&Winter,1982/胡世凱譯,1998);不僅如此,個體對組織慣例的執行還同時受到其他成員對組織慣例執行情況的影響,類似於音樂演奏本身包含了聽別人是如何演奏一樣 (Feldman & Pentland,2003:102)。也正因為組織慣例依賴於個體執行,才使得慣例自身並非僵化不變而是具有許多臨場發揮的特質。Pentland 和 Rueter (1994)將組織慣例比作行動的語法,組織成員會依據實際情況執行,使得慣例的執行如同按照語法造句一樣,可以表現出變化;而 Feldman 和 Pentland(2003)則提出慣例包括表述和執行兩部分,表述部分是慣例的觀念形式,是慣例抽象化、一般化的概念;執行部分指在特定時間和地點,由特定成員實施慣例的特定行為,是慣例的實踐部分。在組織慣例演進的過程中,慣例的表述部分對組織成員的慣例執行起導向、檢討和行動歸類作用,限制和啟動執行部分;執行部分則對於產生、維持和更改表述部分是必不可少的,其結果就是對原有組織慣例的維持、更改或創

新。(高展軍、李垣，2007)

依此來理解新聞常規可以發現，新聞常規實際上同樣依賴於從業者個體的執行，而這種執行往往不是機械的、被動的執行，而是帶有實踐主體反思性的主動執行。儘管新聞常規作為媒介組織反復進行的實踐方式，都要受到截稿時間、消息來源、新聞價值等的影響，但不可否認，這些新聞常規在不同的媒體發展階段以及不同媒介組織內部都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例如新聞改革前後大陸媒體的新聞常規不同，黨報和都市報所遵循的新聞常規亦存在差異。那麼個體在考核制度下所採取的實踐策略是否能激發新的常規產生？個體-組織的互動如何影響到新聞常規？

張文強（2005）對新聞工作的常規樣貌的研究發現，組織內部常規的形成實際上是從業者個體帶著主觀猜測，經由試錯不斷向組織校準的過程。這實際上也就是Breed(1955)、Sigleman(1973)等人所反復強調的從業者個體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程，在沒有績效考核制度的情況下，這種社會化更多依賴於記者招募過程中組織偏向、編輯的偏好、其對稿件的修改以及組織內部其他控制條令等實現；而在績效考核制度實施後，雖然原有的社會化控制機制仍然奏效，但由於考核標準直接關涉個體利益分配，就使得該制度本身也成為個體向組織校準的尺規之一。

訪談中，一位在1980年代末畢業於某名牌高校，接受了西方新聞理念教育的受訪者這樣跟我們評價他所在黨報的績效考核制度的影響，他說在過去沒有績效考核制度時，大家都願意花時間去琢磨一個選題，“那個時候你對問題的看法、理解、深度自然比現在靠一兩天去跑一條稿子（深），那沒法比。”但考核之後，由於發稿量與收入直接相關了，“你沒法去多搞這些事，你數量少了的話，很簡單呀，你連自己丟出去浮動的工資都拿不回來。……（考核收入）那不是靠品質的，得靠數量，既然靠數量，那大家就拼命多出稿子。”而同樣畢業於名校新聞專業，上世紀90年代

未進入新華社工作，後又跳槽到《廣州日報》的一位受訪者則評價說，新華社的考核培養的是“專家型記者”，他“一年的任務一個月可以完成”，平時就選取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去采寫一些深度報導。但到廣日後，主要按發稿量評定，大家只能是“今天採訪完趕緊回去寫，寫完明天就登，第二天就扔了”。該報另有受訪者將自己戲稱為“寫稿機器”，無需什麼專業門檻，勤快與否是決定考核中能否勝出的關鍵。可見，無論是考核前後還是不同考核制度下，個體實踐均表現出顯著差異。而受訪者的這些表述中還透露出的另外一層含義是，儘管他們自身潛在的專業追求沒變，都渴望采寫一些有深度的調查性的稿件，但迫于考核的現實壓力，在具體實踐環節上必須屈從於個人的利益，“以量取勝”。

考核制度下這種個體專業理念與新聞實踐的差異其實正對應於新聞常規的認知和動機兩個維度，認知維度解決的是“怎麼做”的問題，而動機維度解決的則是“為何做”的問題。⁴因此，儘管從業者在個體層面普遍接受西方新聞專業主義模式，但在實踐當中對新聞專業主義理念的理解與應用往往揉合了對現實因素的考量，從業者甚至可能為了迎合組織考核標準而對事實進行某些誇大或扭曲。1999年，武漢長江大橋曾發生一起輕微的駁船擦撞橋墩事故，接到熱線電話趕去採訪的各媒體記者，由於平時就互相認識，採訪完後的閒聊中得知有幾位還沒完成當月的高等級稿，於是大家相約將此事“寫得大一些”，於是見報報導選取了許多材料來說明事件的嚴重性，卻將有關部門現場初步勘察得出的“事件對大橋安全性影響不大”等初步結論以及現場可見到的擦撞痕跡並不嚴重等情況暫不報導或含糊處理，使報導順利成為各大報紙的版面頭條。報導發出後，不少市民誤以為大橋真的很危險而不敢上橋。幾家媒體記者第二天又相約採訪了有關方面，稱事件不大，這類擦撞事故過去已發生近百起，此次也於大橋無損。於是，記者們皆大歡喜：第一篇稿佔據了版面好位置，獲得了較高等級的評定；緊接著又發了後續報導，又完成了一篇任務，掙到了

稿分。而事情的真相，除了報導此事的幾個記者知道，其他讀者，包括編輯部都被蒙在鼓裏。⁵無獨有偶，在中部某都市報，記者爲了上稿，經常把芝麻小事誇成西瓜大事：有哪家居民樓著火，雖然還在火苗期間就被撲滅了，記者也會寫成“火光沖天”；兩車追尾，造成小摩擦，記者會寫成“兩車猛撞，造成交通擁堵”。⁶不明真相的讀者看起來確實是件新聞，但真相究竟爲何卻只有記者本人清楚。而訪談中，廣東某地一家以稿件字數爲考核重點的報社裏，受訪者跟我們說他“倒一棵樹都能寫兩千字”，方法就是多採訪些目擊者和相關部門，盡可能將事件影響誇大。他對此類現象的解釋是：“爲了讓稿件奪目，把一些本來很平淡的東西把它做得很突兀、很有衝擊力。這個很正常，這種事情屢見不鮮。甚至出現假新聞，各種可能都存在。”儘管他也承認這個與記者個人的職業道德水準有關，但他又認爲在考核機制的驅動下，“每個人都是不理性的。”雖然這種觀點有失偏激，但考核作爲一種利益機制，其對從業者行爲選擇的影響仍不容忽視。

從這些資料所顯示的記者爲發稿或獲得高等級稿評定所採取的實踐策略來看，從業者實際上是將新聞專業主義的操作規範，例如客觀報導、平衡報導、使用權威信源等作爲策略來使用，通過對事實資訊的篩選與部分強調達到使事實的新聞價值“看起來很大”的目的，以便於上稿並獲得較高的稿件等級。這種行爲本身當然也反映出組織在稿件價值判斷上的某種偏向，而從業者在考核制度下爲發稿而努力迎合這種偏向則更是強化了組織的此類新聞常規。換個角度來看，上面所引述的資料同時也反映出從業者對組織新聞常規的執行是具有主動性的，因此，對於追求個人專業價值的從業者而言，他們亦可能在現有績效考核制度內發展出自己的專業主義實踐策略。量化考核制度的此類實踐策略大抵可以概括爲兩類，一種是“開拓新聞網”，即通過培養自己的“新聞線人”、結交同行朋友等方式來開拓自己的新聞網路，從更多管道獲取新聞線索，部分擺脫對固定消息來源的依賴；另一種是“抵抗消息來

源控制”，記者可以通過將自己所負責新聞線路上的負面新聞線索交由本媒體其他記者去採訪的“換線採訪”方式，或將線索透露給其他媒體同行的方式來抵抗消息來源的控制。但對長期負責某條線路的記者而言，“換線採訪”依然會不可避免地損害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關係，雖然記者偶爾為之時可以通過“撒撒謊”，假稱不知道採訪者線索從何而來等方式“蒙混過關”，但在缺乏組織制度支援與保障的情況下，這種“非常規”的新聞實踐方式絕不可能常規化，而有媒體卻通過“條線改革”的方式將這種抵抗策略常規化了。

2005年8月南方都市報區域新聞部對“廣州新聞”時政記者進行了條線改革，進行大規模“換崗”，其內部網上公佈的《廣州新聞時政記者崗位競崗通知》中將改革的主要動因闡述為：“主要原因是時政線受廣州地區強大的官方通訊員的控制，我們的時政記者面臨很多困局，難以施展手腳，得罪關係成了跑線記者的噩夢，也束縛了他們的手腳。但我們是要控制與反控制的，所以，當一條線被通訊員管死的時候，我們就需要改變戰術，換記者上。要攪局，來換取新聞的主動權和新聞的更大空間。”⁷這種條線改革打破了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相對穩定的利益關係，使記者一定程度上擺脫由於過分依賴固定信源而帶來的“互盡義務”⁸關係，保障了他們在新聞報導過程中能夠堅持相對客觀和獨立的報導立場，而這種客觀獨立的報導立場正是專業主義得以實踐的基礎要件。

與此同時，幾乎所有媒體的考核制度中都有對記者“漏稿”的懲罰。受訪某報新聞部的一位元年輕記者經常能采寫出所負責的條線上的獨家新聞，以至於其他媒體同跑該線路的記者屢屢因漏稿而受罰。於是，其他幾家媒體的記者便聯合起來“故意整他”，他們相約同去條線單位採訪，然後一起發稿，還經常把稿子炒成頭條，造成受訪該記者漏稿的假像，以至於該記者為免受處罰而不再敢多報導條線上的獨家新聞。報社在發現考核制度的此類負面影響後隨即對原有考核制度中對“漏稿”的界

定進行了調整，由以前“同城媒體中有媒體報導了，本報記者未報導即為漏稿”改為“同城兩家以上媒體報導了，本報記者沒有報導即為漏稿”。在此，從業者個體新聞實踐與組織考核制度的衝突導致了考核中相應條款的修改。儘管這種修改只是微觀層面的細節修訂，但亦顯示出個體實踐對組織制度確能產生影響。而該報的一位中層管理者還向我們表示，隨著該報逐步向主流大報轉型，報紙在理念上開始更加強調“責任意識”，原有的簡單量化的“計件式”考核的弊端也凸顯出來，管理者認識到“你光搞那麼多碎稿子，沒意思”，為配合報紙主流化轉型，報社對考核制度進行了大幅修改，由過去“寫得越多收入越高”的激勵模式轉變為實行“一稿封頂”的激勵模式，即只要從業者當月有一條高品質稿件即可拿最高獎金，而對稿件品質的判定也更強調“社會責任”，鼓勵從業者采寫彰顯社會責任的好稿。受訪者在此所強調的“社會責任”實際也就是新聞專業主義所追求的“服務公共利益”。報紙從追求以量取勝到強化稿件的“社會責任”的變化過程，其實也是組織新聞常規改變的過程，而績效考核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以上分析顯示，績效考核制度影響著組織新聞常規的變化。以量化為主的績效考核制度刺激了從業者個體實踐中的逐利取向，為了多上稿，從業者不僅會主動規避費時費力的調查性報導，甚至不惜以犧牲新聞真實性為代價誇大事實以獲得高等級的高級評定或佔據好的版面位置。儘管單純地從新聞理念層面來看，多數從業者還是渴望實現自己的專業價值，但在關乎個體直接經濟利益的考核制度下，他們卻又不得不屈從于現實情境。與此同時，我們亦發現，量化考核同時也催生了從業者不少“兩全其美”的實踐策略，如開拓“新聞網”、“抵抗消息來源控制”等，這些策略既有助於提高從業者個體的發稿量，同時又部分擺脫了對固定消息來源的依賴，繞開或突破了組織原有新聞常規。而這種個體實踐策略一旦被組織納入制度保障範疇即能迅速轉化為“常規化”的新聞實踐，從而再造了組織的新聞常規。

（二）組織外部控制的內化與報導風險的轉移

上節對績效考核制度對個體行為與組織新聞常規的影響的分析揭示出考核制度作為一種組織內部制度的控制功能，而將這種控制融入來自媒體外部的國家-市場控制中來考察，它所顯示的又不僅是組織控制功能，還包含著外部控制的內化。也就是說，媒體所受國家-市場控制透過組織內部的績效考核可以轉換為個體的控制。而這種自我控制的實現過程如果用一位年輕受訪者的話來描述，就是“長期工作實踐中潛移默化的結果”；用 Breed(1955)和 Sigleman(1973)的理論化表述，則是從業者被“社會化”的結果。誠然，這種“社會化”滲透著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影響，也逃不脫媒介組織外部力量的干預。但不同於西方媒介以新聞專業主義為基礎的社會控制機制，大陸媒體在“黨-國”控制為基礎的新聞體制下，行政命令和意識形態強制往往代替了以新聞專業主義為基礎的社會控制機制（陸曄、潘忠黨，2002），行政力量經常以下達命令、佈置工作等方式對新聞生產活動進行直接干預，將媒介組織視為政府部門理所當然的宣傳工具，同時卻又將其推向市場，使之必須面對市場競爭條件下的種種生存問題，市場利益成為媒介組織必須面對的外部控制力量。但這些外部力量借助於媒體績效考核制度轉化為從業者個體的控制之後則不能再將其稱為是“強制”性的，尤其是自主控制下所誘發組織新聞常規的變遷使得考核機制表現出陸曄、潘忠黨（2002）所謂的“收編”⁹作用，實際是組織在借助利益分配機制誘導或馴化從業者，使其行為符合既定體制下的組織需求。

央視新聞主持人白岩松在與人談及體制問題時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從來不去抱怨體制。你抱怨它會有用嗎？每年都會有規定動作和自選動作，可能是二八，三七開。那我問你，你的自選動作你做好了嗎？如果你的業務水準高，你的規定動作就會減少。哪里不是體制？體制對你的壓抑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說脫離這個體制，還有金

錢的體制，在錢的面前，背叛自己的人更多。”他還提到，自己做節目製片人時要求自己所有工資從上級拿，不從他所在的節目組拿，其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利益的誘惑；而在他做了2年製片人之後，發現自己不僅沒有時間去做主持人了，而且主持的時候也不自由了，“我會想，我要這麼說會不會使得欄目被斃掉？這樣之後就猶豫了。”¹⁰我們可以將這些表述的意涵概括為兩點：其一，體制本身不是僵硬的，從業者自身的專業素質決定著他在體制內自主發揮的空間；其次，現實利益因素是影響從業者實踐行為的不容回避的問題，而當這些現實利益因素進入從業者必須考量的範疇時，他們便會主動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約束。由此看來，績效考核制度作為直接關涉從業者個體利益的組織內部利益分配機制，既有可能調動從業者最大限度利用現有體制下的新聞專業主義實踐空間，亦有可能進一步限定、擠壓新聞專業主義的實踐空間。

上節分析中已經發現，量化考核下，從業者會主動回避費時費力的調查類報導題材。儘管調查類報導是集中體現新聞專業主義的兩大核心內容——服務社會公共利益，遵守專業社區共用的職業倫理和行為規範(Nayman, 1973/轉見潘忠党、陳韜文, 2005)的報導領域，但由於調查類報導不僅需要媒體付出較高的生產成本¹¹，且通常還伴有較高的政治和經濟風險，很容易觸及政府機構或其他社會組織（例如大企業）的利益，因而也往往成為受到國家和市場力量干預較多的報導領域。原《南方週末》的調查記者楊海鵬在談及他自己做調查記者的一些習慣時曾提及，他在遴選新聞線索時往往會較多地考慮調查的難易、價值和報導後風險的大小，因為在很多報社，報導被禁發後，不計入考核任務，連續被禁發則可能不僅影響到記者收入，甚至可能是崗位。¹²《南方都市報》報導孫志剛事件的記者陳峰表示，他在內地工作多年以後，“已經習慣於先去衡量一個報導的風險，而不是這個報導的新聞價值”。¹³個體現實利益作為從業者衡量報導價值時不得不考慮的問題，而績效考核標準則又是決定個

體現實利益的重要因素，因此也就成爲從業者評估報導風險時的重要參照系。由此，來自媒介外部的國家、市場控制借助於利益分配杠杆轉換爲了從業者的自我控制，這種控制方式的轉換對於媒介組織而言不僅降低了報導成本，更爲重要的是將其可能遭遇的政治和經濟風險部分地轉嫁到了從業者個體身上，藉由績效考核制度下從業者個體自我控制達到了媒介組織控制新聞生產風險的目的。

那麼，這種自我控制與報導風險的轉移具體又是如何實現的？訪談中沿海某城市一位參加工作不到 3 年的時政新聞記者向我們表示，他剛進入媒體工作時還“懷抱著新聞理想”，認爲記者應當扮演“社會監督者”的角色，披露社會負面現象，但實踐中發現，此類稿件在考核中往往得不到相應的回報。有一次他發現某政府部門網站的投訴欄洩露了投訴者的個人隱私，他認爲很有新聞價值，並采寫了一則篇幅不小的報導，結果稿件見報時非但篇幅很短，所處版面位置也很不起眼。而該媒體的考核是根據稿件所占的版面大小進行的，這也就意味著這則報導在考核中對應的稿酬收入很低。他還曾報導某政府部門對企業進行執法檢查時存在的執法不公問題，稿件也是幾經波折才被刊發在不起眼的位置上。類似的事情經歷多了，他就總結出了組織對稿件處理的基本原則“批評政府是絕對不可以的，但批評企業沒問題，比如食品安全問題，在有確鑿證據情況下，你怎麼批評都行。”

某省級黨報的一位受訪者也是在反復的稿件取舍當中開始掌握組織的稿件判斷標準的。他所負責的公安線路如果是在都市報通常是難得的肥線，不僅經常有案件可報導，而且因爲此類新聞較受讀者關注，稿件往往也易於佔據好的版面位置；但在受訪者所在的黨報卻只是很普通的新聞線路。“我的線上，也不是說不能碰（案件），比如說有個導向問題，它不願意做大，比如說 X 地死了多少人，它可能不願意做大，要變種方式來做，比如說政府怎樣重視、怎樣去查呀、怎樣去舉一反三呀。……黨報它給你的思路就是這樣的，編輯給你的思路就是這樣。比如說你寫場面多惡劣呀，

他不給你發，一次兩次，慢慢你就知道了。而且主任也會不斷提醒你，告訴你應該怎樣寫呀。”中部某黨報的受訪者也表示：“你不按考核標準來寫，你吃什麼？”此外，有研究者對南方都市報編輯室內工作狀況的觀察也有類似發現，“‘流水線’式的採編機制和‘計件式’的稿費制度是最重要、最直接的控制途徑”，其中，“計件式”的稿酬制度影響從業者的價值觀念，傳播和強化了編輯部的“新聞政策”¹⁴。所有這些觀察與 Breed（1955）對編輯室的社會控制的觀察是大體一致的，即編輯的偏好與需求影響著記者的新聞采寫行爲，不同的地方在於，在這裏，編輯室的這種控制實際上是通過績效考核的利益分配機制來實現的。那麼，既然績效考核借助利益分配杠杆能夠將來自媒介組織外部的國家和市場控制力量轉換爲從業者個體的控制，將新聞生產的政治、經濟風險轉移爲從業者個體的報導風險；那麼不同的績效考核制度所導致的自我控制程度和風險轉移程度也當存在差別，並會對從業者的專業主義實踐產生不同的影響，而從訪談所獲得的資料來看也確實如此。

南方兩家市場化程度相當的報紙，其中甲報的考核制度是按照見報稿件大小進行考核，稿件占版面位置越大稿費越高，採訪了但稿件未見報則不計稿酬；乙報的考核制度在一定發稿量的基礎上著重考核稿件的質，高等級的稿件稿酬也相應較高，如果記者採訪了但是由於外部因素而導致稿件不能見報，報社會根據記者的工作量給予五至六成的稿酬回報。這兩種不同的利益分配機制影響著記者對事件報導風險的評估和對應的行爲選擇。

甲報機動部的一位元記者經常要去跑一些重大突發事件，例如礦難、火災、突發的疫情等。這些事件本身都屬於政治風險較高的事件，也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預。但受訪者表示，他採訪時擔心的不是“外面的問題”，不擔心“跟地方政府衝突”，擔心的反而是“後方”，也就是他們報社自己。因爲一旦報社受到來自政府部門的壓力馬上會將壓力轉移到記者身上，要求記者中止採訪不說，稿件不能見報自然也就

沒有稿酬，記者等於白忙活。而在與甲報其他受訪者交談的過程中，我們還獲知了這樣兩件事，一是該報某記者深入某地調查報導了當地一起重大殺人案，稿件在全國都是獨家新聞，影響也很大，但中央某部對報導不滿，向報社施壓，結果記者非但沒有因為采寫了獨家新聞而得到報社表揚，反而被要求再三地寫檢查，該記者最後心灰意冷放棄了記者崗位而改做了編輯。另一件事也與此類似，記者報導某地養殖場牲畜死亡事件，對死亡牲畜數量逐一清點後如實地做了報導，結果當地政府向報社施壓，稱報導不實，報社便要求記者寫檢查，直到後來法院裁判的事實與記者調查的事實一致，記者的“冤情”才得以洗刷，即便如此，報社也未對記者給予任何補償，只讓記者再寫一份澄清了事。可見，甲報的考核制度實際上通過收入分配和獎懲機制將原本屬於媒介組織的政治和經濟報導風險轉嫁給了個體從業者。面對這樣的考核機制，記者不僅不願意多做調查類報導，更對記者的職業價值產生了懷疑，多位受訪者表示做記者“沒前途”、“沒意思”。在此，績效考核下報導風險的轉移不僅干預了從業者的專業自主，還進一步影響了從業者的專業認同。而作為這種影響的另一個結果則是該報機動部新聞常規的變化，用一位受訪者的話來描述：“像他們現在機動部做出來的策劃，反正在我看來已經不是深度報導了……反正就是粉飾太平的感覺……比如做什麼跟改革開放有關的，然後你採訪大人物，採訪日本的泡沫經濟什麼的，這種事情你說會得罪誰啊，誰都不會得罪。”而機動部的受訪者則表示這樣一來“皆大歡喜”，記者、報導物件和報紙都少了麻煩。這其實是績效考核之下，從業者為避免因違規而遭受懲罰改而選取相對安全的報導選題，再度證實了上節中我們所討論的績效考核制度下個體新聞實踐與組織新聞常規的互動對組織新聞常規的再造作用。但我們在本節強調的是受訪者此類表述邏輯背後隱含的另層含義，即個體從業者並非不願意犧牲部分個體經濟收益而去實踐專業價值，但在考核非但不保障個體經濟利益還附帶將政治風險也轉移至從業者個體

時，從業者為保住自己的利益不得不依考核標準來評估報導風險，決定報導選題。而乙報的考核制度不僅考核從業者見報稿件的數量與品質，同時還將採訪的勞動投入納入考核之中，對於因為受到外部政治或經濟壓力而不能見報的稿件，報社也會參照其勞動強度給予一定程度補償。具體到報導本身可能遭遇的政治風險，乙報一管理者是這樣描述的：“我們堅決維護員工的合法權益。……我跟我的同事講，如果沒有寫失實報導，沒有敲詐勒索，正常地執行職務行爲，我這個部門主任，你在我之前下崗，對我來說是一種恥辱。我會首先承擔我的責任，我不會讓我的記者去承擔這個責任。”有記者調查報導了某地的基層民主選舉，稿件發出後被認為違反了宣傳紀律，報社老總先下臺，部門主任扣工資，報導該事的記者反而沒事。這與甲報稿件出了問題，記者首先寫檢討的處置方式截然不同。乙報管理者將記者採訪比作“買菜”，只要他把菜買回來了就可以，至於把關則是編輯和領導的事，對記者而言“採訪任何東西都是無罪的。”對於處於國家-市場控制之下的大陸媒體而言，新聞報導，尤其是調查類報導的政治和經濟風險問題是難以回避的現實問題，從從業者個體的專業理念上來說，確實如乙報受訪者所言，記者按照嚴格的職業規範去採訪任何東西都是無罪的，稿件由於外部政治或經濟壓力而不能發表或者發表後受到黨政機構的批評，問題不能歸責于記者。但甲報的績效考核制度將這種報導風險轉嫁到記者個體身上，媒介組織面臨的政治、經濟風險變爲了記者個體的政治、經濟風險；即便是在制度上對從業者專業主義實踐給予較高保護與保障的乙報，稿件如果未能見報記者稿費也是要打折扣的，但記者損失僅僅是經濟上的，政治風險還是由組織層面來承擔。這種考核制度上的差異對從業者的新聞實踐邏輯也產生了差異化的影響。“專業”、“新聞職業化”、“專業價值”等這些在甲報受訪者們口中鮮被提及的話語卻是乙報多位受訪者訪談過程中頻繁出現的關鍵字。

實際上，大陸媒體所受的國家-市場控制本身是一種彈性控制，用乙報一位受訪者的

話來說，“這個彈性就看你的領悟水準了，全國媒體都這樣。”也正因如此，組織制度保障的多寡也就成爲從業者實踐過程中理解彈性的重要影響因素。在甲報這樣報導風險轉由個體承擔的情況下，記者回避敏感性、高風險的調查類報導題材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乙報記者所處的組織制度環境則相對寬鬆得多，“把關不是記者的事”，出了問題首先問責的是領導，稿件即便未刊出也能視勞動強度獲得經濟補償，這就爲記者發揮主觀能動性，策略性地抵抗各類外部壓力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障。有研究對該報深度報導生產的考察中就發現，記者的“臨場發揮”主要體現敢“闖”的主動意識和善“闖”的操作策略上。有記者報導上海拆遷引發的企業與民眾衝突導致兩位老人被燒死的事件，由於拆遷公司是徐匯區政府的全資集團公司，牽涉政府與地產合謀問題，且拆遷問題本身就比較敏感，而上海又是個“很牛x”的地方，稍有不慎容易惹火上身。”因此，該選題的報導風險很大。記者本人也擔心稿子做了發不出來，“好在案子已經破了，東方網發了 300 字左右的消息，領導覺得值得做。我擔心敏感，做了發不了，他說不用擔心，這個不是你考慮的問題。要處罰也一定是罰我們領導，不懲罰你記者的。”最終，稿件還是見報了。¹⁵甲乙兩報同處一地，媒介組織所處的外部政策環境大抵接近，但從業者的專業主義實踐策略卻大不相同，這不能不說與組織內部制度，尤其是截然不同的考核制度相關。

所有這些表明，績效考核制度在組織功能層面所扮演的不僅僅是激勵從業者，調動其工作熱情的角色，它以利益分配爲控制手段，將國家-市場控制之下組織的報導風險轉化爲從業者的個體的經濟乃至政治風險，迫使從業者在新聞生產過程中對自己的實踐行爲施以自我控制，主動回避敏感的、高風險的調查類報導題材，在降低組織生產成本的同時也降低了組織的報導風險。在現有新聞體制限定的專業主義實踐空間中，空間大小的彈性範圍實際上一方面取決於記者個體的專業水準的高低，另一方面則取決於媒介組織對專業主義實踐的保障程度，或者說組織爲從業者專業自

主所提供的制度空間。當組織在考核機制上為從業者給予實際的政治、經濟支持時，從業者方能更為有效地發揮其專業自主，充分利用專業主義實踐的體制空間來實踐個體與組織的專業價值。

（三）“補償網路”的個體化與記者專業認同的削弱

至此，我們的討論集中在媒體績效考核制度對從業者微觀實踐的具體影響及其作用機制上，尚未將其與制度實施背景關聯起來分析。媒體績效考核制度是在媒介市場化背景下產生的，初衷是為改革利益分配方式調動從業者工作積極性，也可以被視為是媒體為化解“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的內在體制衝突而採取的一種組織內部控制手段。儘管它主要考核的是從業者個體的新聞生產行為，但在部分媒體中或直接附加有對從業者經營性業務的考核，或間接以經營業務提成等方式影響著從業者的收入構成，這就引出了本節所要討論的“補償網路”的個體化問題。

“補償網路”是潘忠黨（1997b, 1997c）在討論大陸新聞改革過程時提出的一個概念，它所描述的是經濟資源的控制與新聞現實間的關係。在他看來，新聞改革引發的媒介組織的一個基本變化就在於，置身於市場經濟之中的新聞媒介面臨著企業化經營問題，支援新聞媒介運營的財經分配系統發生了深刻變化，新聞生產轉由企業提供經費，媒體經營性活動對新聞生產活動進行補貼；補貼的方式則包括廣告、贊助、經營合作以及備受爭議的“有償新聞”等，這些補貼拓展了媒體原有的新聞生產的“事實性網路”，同時亦引發了原有新聞生產中的權力關係的變化。市場力量透過“補償網路”制約和影響著新聞生產實踐；同時由於媒介內容的受眾構成、媒介組織與對其進行財經補貼的機構間關係網絡的疏密程度等，直接影響著企業廣告投放與否的選擇，該補償網路的結構就導致了媒介內容上的偏向。如此一來，“補償網路”就不再單純是從經濟上對新聞生產給予補償的資源關係網絡，同時也可以

擴大到直接的新聞線索和資訊的提供，具有引發“事實性網路”的潛力。潘忠黨對“補償網路”概念的闡述主要是從媒介組織層面進行的，他所關注的實際上是新聞改革背景下，媒介市場化運作初期處理媒體“事業單位、企業管理”這一雙重屬性的內在矛盾時所採取的經營策略及其對新聞生產的影響。他強調了該網路在結構過程中的“隨意性”和從業人員的“臨場發揮”，但實際上，隨著媒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市場力量對新聞網路進行滲透與操控的形式也可能發生了變化，而借助於組織內部制度，原本“隨意性”的，靠從業者“臨場發揮”締結“補償網路”也有可能被正當化、常規化。

南方某黨報的一位受訪者將其工作總結為“四項任務”，這四項任務分別是：新聞報導、推銷報紙、政府公關和商業廣告。該報考核制度規定從業者每月必須完成 3 萬字的寫稿任務，但“軟廣告”也計算在內，記者拉一個版的廣告就相當於完成了 6000 字的寫稿任務，同時還有廣告提成。受訪者稱“我們有些記者一年可以拉三四百萬，那（這種考核制度對我們）影響是非常大，如果是 8%的提成，可以拿好幾十萬。比他的工資還高，比他所有的工資、獎金還高。我們整天是看不到他的。我們有一個主任我就看不到他，我打電話讓他來採訪，他可以不聽我的。他說我有事，我在外面談廣告。那我沒辦法啊，我只好安排另一個人去呀。因為他不需要寫這個稿子，寫這個稿子對他一點意義都沒有。就是五十塊錢，或五十分。你說影響大不大？”

儘管受訪媒體中類似該報這樣明確規定“軟廣告”可以沖抵新聞采寫任務的沒有第二家，但規定記者從事經營性業務可以獲提成的卻不在少數。中部某報受訪者在說到拉廣告時一臉無奈：“我們這記者拉廣告提成也不高，大概是 5%，沒有任務，我們自己也不願意去拉，一般也就碰到天時地利人和的，某個單位剛好要發佈什麼招標公告之類的，那就做一下，一般也不多。但如果你不拉，報社沒有廣告，大家利

益還是受影響。”這段表述中透露出的意思是，即便記者從專業出發能夠抵禦廣告提成的誘惑，但考慮到報社整體經濟收益受損最後還是會波及他們的個體利益，他們還是要去拉廣告。而在中部另一家報社，儘管記者個人也沒有拉廣告的任務，但部門有；且記者個人拉來的廣告，不僅個人有提成，其所在部門也有提成。有的部門主任心思就不放在新聞業務上，反而更在意廣告。有位受訪者跑的新聞線路同時還有另外兩名記者也在跑，相互之間經常會發生搶線的事，主任雖然知道卻也不去協調，反倒是對拉廣告的事更上心，有時候甚至會主動要求記者“你到哪個哪個單位去，搞點版面回來吧。”甚至“還有相當級別的人出去搞錢，一點自尊都沒有。”

還有的報社，例如訪談中接觸到的東部某報，雖然報社廣告多少與記者無關，但發行多少卻與記者有關，甚至成為記者判斷新聞條線好壞的重要依據。一些佔據著好的企業線的記者一年發行提成所得可能遠遠超過一個記者辛苦工作一年全部工資加獎金的總和。該報的一位受訪者是這樣向我們描述這種現象的：“我們訂一份報紙提成 10 塊錢，多的能訂到幾千份成千上萬份。……比如說房產公司，它因為訂很多報紙的話，我們也會有一些報導和廣告上的返還嘛，那它可能出於自己的需要，然後它同時也想跟媒體維護關係的。它也很清楚這一套，可能一訂就一千份、兩千份這樣的，一家公司可能一訂就是三千份這樣。但政府部門的話，一般的部門你再多可能也就一兩百份、兩三百份了不起了吧。”可見，儘管國家已經取消了行政力量的強行攤派，公費訂閱的經費也大幅削減，但熟知報社運作規律的企業卻通過發行來進行媒體公關，一方面獲得報社在廣告和報導上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又通過發行與記者打好了關係，使之為其宣傳服務。而且，據受訪者說，在他們那，新聞線路一般很少調整，這也就意味著記者與消息來源的利益關係一經建立實際上就會發展為相對穩定的利益紐帶，而“補償網路”的這個節點也不再是“隨意性”的，而是相對固化的了。

這種“補償網路”個體化無疑有損於從業者的專業主義實踐，而以組織制度限定從業者的經營性行為按理來說明確了他們的專業身份，應當受到從業者的歡迎，但訪談中卻發現有受訪者對此並不贊同：“我在某地時，記者很牛的，一年拉廣告都有幾萬元提成，XXX報拉個廣告一分錢都沒有，（訪談者：那是好事）是好事，但日子畢竟難一點，掙的錢少一點，但從理論上說，我們這種模式將來要普及的，但從個人來說，從業人員的壓力最大。……X城這邊沒有紅包的……在某地隨便開個會200，300，隨便的；北京也是，300，500的，記者很牛。我在這做了兩年記者一個紅包也沒拿到。”受訪者非但未將拿“紅包”視為有違職業規範的行為而感到抵觸，反而將“紅包”的多少視為記者社會地位高低的標誌，言語中充滿著對現狀的不滿。儘管他亦承認廣告與採編分離是“好事”，也是媒體未來發展的趨勢，但從個體收益角度出發，他又認為報社制度不甚合理。我們認為，受訪者這種心態所反映的實際上是媒介在快速市場化過程中利潤積累與採編投入比例失衡的問題，暴露出當前媒體考核機制的一個關鍵弊病，即採編投入偏低，導致現有考核制度內，記者勞動價值與專業價值得不到合理回報，進而部分地導致了從業者對拉廣告、搞發行、做“有償新聞”等有違職業規範的行為的認同。這種不合理的組織制度實際上變相地推動了廣告、發行等原本從組織層面對新聞生產進行補貼的“補償網路”，向從個體層面對從業者經濟收入進行補貼的“補償網路”的轉換，這是本部分標題中所謂的“補償網路”的個體化的第一個層面的含義。

“補償網路”的個體化的第二層含義表現在其對新聞生產的“事實性網路”的影響上。前面東部某報受訪者所說的企業“也很清楚這套”，“這套”實際上說的就是企業通過訂報與媒體和記者建立起一種利益合作關係，利用這種合作關係來達到宣傳自己的目的，這就使企業成為媒體“新聞網”上的一個節點，媒體與企業間的資源交換具體化為記者個體的報導資源與企業間報導需求的交換。如該報受訪者在說

到為何訂報多的企業肯定記者發稿量也大的時候是這麼說的：“訂報紙是一塊大頭，而且呢，說老實話，你報紙訂的多的話，它肯定是因為宣傳需要多，所以報紙會訂得多，宣傳需要多的話它平時跟記者的互動也會很多，那稿子也容易出啊。”這種訂報大戶與記者間頻繁的互動也就意味著該企業的相關新聞會更為頻繁地出現在媒體上，而其他未與記者建立此類關聯的企業或機構則很可能被排除在報導範圍之外。“補償網路”對“事實性網路”的影響從中體現出來。

此外，在廣告和發行提成之外，“紅包”、“車馬費”等“有償新聞”形式其實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記者收入的補償管道。不少媒體雖然未明確支持，卻在線路分配上體現出對此類現象的默認。用受訪者的話來說，報社在分配新聞線路時都會考慮“肥瘦搭配”，所謂“肥線”指那些易出稿的線路，如都市類媒體中的公安線，對於負責該條線的記者而言，不僅意味著經常有案件可供報導，而且由於這類新聞往往頗受受眾關注，稿件也容易佔據好的版面位置；而所謂“瘦線”則是那些不太容易出稿的線路，但此類線路中有的雖然出稿相對較少，紅包收入卻相對較高，例如企業線。媒體在進行線路分配會考慮“肥瘦搭配”，保證從業者採編收入的大致公平。

而除了業內人士通常所說的“紅包”、“車馬費”之外，訪談中，我們還發現，事實上，“有償新聞”的形式還包括收取投訴人的“感謝費”去曝光被投訴者，更有甚者將批評報導“當槍使”，以此向被曝光單位變相地索要錢財。東部某電視臺記者說，在他們台裏有兩類記者，一類是很會做新聞的，一類是很會做人的，前者給欄目帶來好節目，後者可以帶來好的“原材料”。他所說的“原材料”指的是“負面新聞”，“如果人家（拿去）送領導，那就是好信源，那被曝光的爲了新聞報導不被播出，就要給領導行賄，如果領導覺得自己要得起一般就會收下，然後不播出新聞。至於送什麼級別的領導，那就要看誰能搞得定新聞，如果送部主任能搞定就

送部主任，不行就送台長，再不行就宣傳部長。……領導對暗訪都‘上癮’，都希望下屬去做，當槍使。……一般來說，如果送到位了就不播，如果沒有送到位，就播。……如果沒有播出的，領導就會解釋說誰過來打招呼了，但是誰收了好處，大家也知道。”如此一來，該媒體的批評報導表面看來數量增多了，但報導卻並非從服務公眾的目的出發，也不是為了從經濟上對組織新聞生產進行補貼，而是純粹從領導喜好、個體利益出發。“補償網路”的這種個體化在對個體進行經濟乃至是關係網絡上的補貼的同時亦生成了媒體新聞生產的“事實性網路”上的新的節點，只不過在記者樂於“懲奸除惡”的正義表像之下潛藏的卻是將媒體公共資源作為個體利益交換工具的陰暗事實。

當然，在媒體既定的利益分配機制內，這種“補償網路”的個體化也並非是完全消極的。有受訪者即用“養新聞”一詞來概括了他所理解的“有償新聞”的作用。該受訪者是南方某報的一位資深記者，他用“好新聞是靠養的”來概括他的採訪之道，其意思就是他可以通過“有償新聞”的收入來補貼其他經濟收入上並不合算的調查類報導的生產成本。而中部某台的一位元年輕記者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只是其補貼的方式主要不是有償新聞，而是自己與人合夥開的公司的分紅。因為有了分紅作為自己的收入保障，他可以不去做那些“小火災、車禍”之類的“不是新聞的新聞”，而選擇自己認為更有價值的事件進行報導。但他公司的客戶資源較大程度上來源於他工作中積累的訊息源資源，而他為了維護這些資源也常盡可能地為他們提供一些宣傳服務，“比如這個公司搞了個活動本來沒什麼可報的，我在裏面給他拎出一個新聞點了，不就能報了麼？”。在此意義上，“補償網路”的個體化實際上在補貼新聞生產，引發新聞生產的“事實性網路”之外又衍生出第三個層面的內涵，扮演著從業者個體社會資本積累與交換網路的角色，將原本局限於媒體內部的“補償網路”置換為個體與媒體外部社會資源進行交換的網路，而這個網路反過來

又補貼了從業者的專業主義實踐。

從當前媒體實踐來看，儘管“補償網路”的個體化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從整體來看，非專業工作對專業工作的滲透或補貼還是不可避免地干預了從業者的專業自主，侵蝕著從業者的專業認同感。“記者這個職業是被有些人有些媒體糟蹋的不行了”，有受訪者這樣說；“特別像拜年廣告的時候，好幾個人跑一個單位去，人家就會說，怎麼你們電視臺就知道要錢？所以現在記者也難當，人家都不願意接受你採訪，你做新聞也都是做假新聞，做新聞也是爲了錢來做新聞，你的威信一點都沒有了。”也有受訪者這樣說；“按照我們以前理解的話，記者應該是很純粹的，你就是寫稿，你寫稿就不存在這些問題了，你現在要出去抓錢，那要抓錢的話，有些話就不好說，那很多地方你就沒有尊嚴”，還有受訪者這麼說。而即便是經營與採編相分離的沿海某報，廣告干預新聞的現象亦十分普遍，“一切採編爲經營讓路。現在很搞笑的就是，每天晚上，廣告部就會派一個人去監控所有的稿件，廣告部有權力改動記者的所有文字。”記者稿件一旦觸及廣告商利益，廣告部有權要求記者修改，而記者也往往很難抗拒。

對於作爲專業的新聞業而言，只有當它獲得了對於決定從事其專業工作的正確內容和有效方法的排他性權力時，它才具有穩固的地位（劉思達，2006）。而“客觀性”正是新聞業至關重要的場域邊界（Bourdieu & Wacquant, 1992/ 李猛、李康譯，2004:138），廣告、發行以及“有償新聞”等有違新聞專業規範的行爲在影響報導的客觀性的同時也破壞了作爲專業的新聞業的穩固地位。因此，在新聞改革過程中，“補償網路”固然爲新聞生產提供了必要的資金支援，推動了媒體內容和經營方式的重大變革，但它對新聞生產的“事實性網路”的過度滲透已經顯示出了它對從業者專業實踐之獨立性的干預。尤其是，在媒體不合理的績效考核制度下，從業者的專業實踐與專業價值得不到合理的經濟回報，“補償網路”便借助廣告、發行提成、

有償新聞等方式落實到從業者個體層面，在對從業者經濟收入予以補貼的同時也束縛了從業者的專業自主：當從業者屈從於廣告主的利益進行新聞生產活動時，報導的客觀性受到影響，其行爲也不再屬於專業場域之中；而從業者以記者身份跨場域地去從事經營性業務則更是一種專業角色錯位的行爲，消解了記者對自我專業身份的認同。

結語

大陸新聞改革進行到今天，由於改革本身缺乏明確目標，而黨-國控制的體制基礎又一時難以改變，黨對媒體的控制、市場對媒體的誘惑和支配以及專業服務意識對媒體自主的壓力（陸曄、潘忠黨，2002）構成了所有大陸新聞從業者共同面對的現實生存環境。這些外部條件固然部分地限定了從業者實踐新聞專業主義的空間，但該空間本身不是僵化不變的，從業者以“臨場發揮”為基本行爲特徵的個體實踐有可能利用個體智慧繞開或回避專業主義實踐與既定體制間的衝突從而實踐自己的專業價值，但其“臨場發揮”的可能性與主動性卻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個體利益的牽制。在不合理的媒體考核機制下，從業者的專業價值與現實利益間的激烈衝突甚至部分地取代了專業價值與新聞體制間的衝突，成為決定從業者新聞實踐邏輯的關鍵因素。

訪談中，我們發現，儘管多數受訪者在理念和價值層面認同新聞專業主義，也時常提到“新聞理想”、“專業價值”或“媒體功能”類的話題，但具體到行動層面，影響他們更多的卻還是現實利益因素。某省級黨報的一位元年輕記者，儘管他對於黨報的辦報理念極不認同，認為“黨報的編輯，包括領導，都沒有把自己當成辦報人”，他們做的很多新聞“從根源上就不是新聞”；而他所認可的則是像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那樣的專業媒體。但被問及他所嚮往的媒體時，他的回答卻是“人民

日報”，理由是“地位高、保障好”。而一位從新華社跳槽到市場化媒體的從業者，跳槽之後卻心生悔意，很是懷念過去的工作環境，用其同事的話來解釋“他做新華社記者他是個爺，他在這裏做記者他是個民工”。當然，這些衝突首先是體制衝突的體現，在黨-國控制的體制基礎下，距離權力中心較近的媒體在很多資源上仍佔據著壟斷優勢，其從業者擁有的社會地位也相對較高；但不可否認，這種衝突同時也是利益衝突的體現，從業者所表現出的選擇傾向實際上是專業價值向現實利益屈服的結果。

因此，本研究不同於既往以國家-市場為研究視角的新聞生產研究，所強調的不是組織外部力量對專業主義實踐的干預；而是從個體-組織視角出發，考察大陸媒體績效考核制度下從業者的微觀實踐行爲，強調的是組織內部制度對從業者專業主義實踐的影響。

研究發現，在現行新聞體制提供的專業主義實踐空間中，績效考核制度作為直接關涉從業者個體利益的組織控制手段直接決定著從業者追求專業主義實踐空間的維度。不合理的績效考核制度實際上不僅構成了對既定專業主義實踐空間的再度束縛，限制著從業者“臨場發揮”的可能性；同時還將原本用以對組織新聞生產進行財經或資訊補貼的“補償網路”延伸到了個體層面，扭曲了從業者的專業主義實踐邏輯，削弱了從業者的專業認同。

事實上，從訪談資料來看，我國新聞從業者在專業理念層面的確普遍認同新聞專業主義，渴望實踐自我的專業價值，但正如有受訪者所提及的，在一些重大事件面前，他們所擔心並非來自外部的行政干預，而是來自自己報社“後方”的不支持。報導未見報沒有稿費、稿件出了問題記者寫檢查甚至可能下崗，在這種強大的組織內部壓力之下，當從業者個體生存尚成爲問題的時候，我們的確很難要求他們再去履行什麼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或職責。儘管如張文強（2002）對臺灣媒體內部權力運作

過程中所發現的從業者的抵抗策略一樣，在大陸媒體現有績效考核制度下，從業者亦可借助其“知識資本”，同時配合他們的創意思考，衍生出許多“平民抗拒策略”來回應組織控制，如為多發稿而主動開拓新聞網、與其他記者“換線採訪”披露訊息源的負面新聞、為回避報導風險主動放棄某些調查類題材改而策劃一些讓大家都“皆大歡喜”的報導題材、或是以“有償新聞”補貼其他調查類報導的成本投入等等，這些策略有的體現了從業者在考核制度下實踐新聞專業主義的個人智慧，有的則體現了考核制度下個體“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但歸結起來看無不是圍繞著個體利益與組織制度這對核心衝突而展開的。雖然組織外部的國家和市場控制實際上也內化在組織考核制度之中，但“計件式”的量化考核並非國家-市場控制下組織唯一可選的考核制度。在少數媒體以實現從業者專業價值為核心的考核制度下，從業者所發展出的專業主義實踐策略就與上述的截然不同，在沿海的幾家專業主義取向的媒體中，考核強調的是對稿件質的考核，同時，將從業者采寫的勞動投入也納入考核範疇之中，稿件的報導風險主要由組織來程度，極少波及記者個體，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在組織內部盡可能保障從業者專業主義實踐的可能，而在該制度下也確實培育和發展出了記者面對高風險的報導題材敢“闖”的主動意識和善“闖”的操作策略（參見張志安，2008：167）。而在既定新聞體制所提供的專業主義實踐空間內，這種敢“闖”與善“闖”的主動意識和操作策略正是從業者發揮其實踐主體反思性實踐專業價值的關鍵所在。

儘管本研究考察的是大陸媒體績效考核制度下帶有片段化特徵的從業者的專業主義實踐邏輯，但指向的是這種邏輯得以確立的制度情境，落腳在對現行體制中阻礙新聞專業主義實踐的制度規範的批判。而這種批判本身又必須是置身于現實體制中的，在體制基礎無法改變，媒體必須面臨國家和市場雙重控制的現實條件下，我們固然不能強求媒體擺脫體制束縛保障新聞專業主義實踐的常規化，但專業主義意涵

之中包含的“社會託管者專業主義 (social trustee professionalism)”和“公民專業主義 (civic professionalism)”這樣的民主社會目標 (Freidson, 2001: 131) 卻是新聞改革過程中媒體必須始終關注的內容。為此，在有限的體制空間內通過完善組織制度來最大限度地保障從業者的專業主義實踐不失為現實條件下的一種最佳選擇，而這些組織制度不僅包括本研究中所討論的績效考核制度，還包括內部新聞評獎、人才提拔、崗位規劃等與從業者利益息息相關的各項組織制度，只有在組織制度層面對從業者的專業主義實踐予以有效保障方有可能使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與規範落實到具體實踐層面，並通過從業者實踐中主動性的發揮不斷開拓現行體制下新聞專業主義實踐的現實空間。

注釋：

¹ 從訪談資料和相關文獻來看，大陸媒體績效考核制度首先是在較早步入市場化的媒體中確立的，如華西都市報自 1995 年創辦之初就開始摸索適合都市報的績效考核制度，廣州日報在 1996 年成立報業集團後也逐步確立起自己的一套績效考核體系，隨著績效考核制度影響的擴大，其他一些媒體也紛紛開始將績效考核機制引入組織管理體系中，湖北日報、河南日報、南方日報等均在 2000 年左右建立自己的量化考核制度。相關文獻資料參見曹鵬，1999；尹連根，2002，2003a；王亞明，2005；陳柏健，2006；肖燕雄，2008 等。

² 見張志安. 報導如何深入：關於深度報導的精英訪談及經典案例. 南方日報出版社. 2006 年：8-10.

³ 本研究中的新聞從業者主要指的是報紙、廣播、電視媒體中從事新聞採訪和編輯的一線工作人員及相關部門的管理人員。

⁴ 參見組織常規相關理論，組織常規包括認知與動機兩個維度，分別對應“怎麼做”和“為何做”問題，新聞常規和其他組織常規一樣也包含這兩個維度，例如記者依循新聞價值標準來對事實進行判斷並決定報導的力度，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卻必須考慮報導能否被發出、報導風險與收益比是否合適等“為何做”的現實問題。組織常規相關理論參見 Nelson & Winter, 1982/胡世凱譯, Feldman & Pentland, 2003.

⁵ 見黎勇. “真實”掌握在記者手中——媒體內部考評機制與新聞失真. 青年記者. 2005 (1).

⁶ 見薛麗. 報業績效考核機制對新聞生產的影響——以《楚天金報》為例. 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7：36.

⁷ 見張志安. 編輯部場域的新聞生產. 復旦大學博士論文. 2006：70-71.

⁸ 為了取得某些新聞，記者常會以壓下某些消息不予發佈作為交換條件，這種與採訪物件之間的交換行為普遍存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記者藉此獲得機密性、不可引述來源的內幕消息，甚至發展為記者與採訪物件之間的普遍合作關係，甘斯 (轉見 Roscho, 1975/董雪影譯, 1994) 認為，這種“互盡義務制度”的最後結果就是記者遭到“收編”。本處亦借用“互盡義務”這一概念來表述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由於負責固定線路的記者長期與該線路的消息提供者接觸，為了獲取信任，維持長期和諧的合作關係，記者往往不會報導該線路的負面新聞，而訊息源則以提供穩定的新聞線索作為回報，雙方“互盡義務”。

⁹ 陸曄、潘忠黨 (2002) 使用“收編 (co-opt)”一詞來描述權力中心將“異類”話語和實踐納入主導意識形態和權力體系並使之正當化和常規化，馴化為現存體制的一部分的過程。他們使用該詞所強調的是官方意識形態話語被從業者吸納到專業主義話語實踐中的過程，並將後者對前者的吸納稱為“反向收編”。我們在此使用“收編”一詞則主要強調的是組織內部制度對意識形態強制的“非強制化”作用，即通過利益分配使這種強制控制成為從業者下意識的主動限定。

¹⁰ 見吳虹飛. 八卦公眾話語：娛樂至死. 江蘇文藝出版社. 2008. 2009年5月20日取自新浪讀書頻道連載
<http://book.sina.com.cn/new/nzt/vip/59321/42322.html>.

¹¹ 這種生產成本不僅僅指的是用以調查事件真相所需要投入的採編成本，還包括報導本身所可能遭遇的政治和經濟風險成本，如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預嚴重的可能導致報紙停刊休整；經濟力量干預中最常見的是被批評企業以撤廣告或不在該報刊登廣告為要脅要求報社更正報導；還有的比如，批評報導引發的媒體的訴訟官司所牽涉的經濟成本等等。

¹² 見張志安. 報導如何深入. 關於深度報導的精英訪談及經典案例. 南方日報出版社. 2006：187.

¹³ 同上，第139頁。

¹⁴ 見張志安. 編輯部場域的新聞生產. 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6：69.

¹⁵ 見張志安. 新聞生產與社會控制的張力呈現——對《南方都市報》深度報導的個案分析. 新聞與傳播評論 (2007-2008年卷). 武漢出版社. 2008：167.

參考文獻：

[英]安東尼·吉登斯著. 李康、李猛譯. 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大綱.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8. 原書：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1984.

[美]Bernard Roshco 著. 董雪影譯：製作新聞.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原書：Roshco, B., *Newsmak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1975.

曹鵬. 中國報業發展研究. 新華出版社. 1999.

陳懷林. 九十年代中國傳媒的制度演變. 二十一世紀 (香港). 1999 (53). 2008年2月28日取自以下網址. <http://www.jflycn.net/dscn/file.php?id=2980>.

陳懷林. 試析中國媒體制度的漸進改革——以報業為案例. 新聞學研究 (臺灣). 2000 (62).

陳柏健. 採編績效管理的實踐與思考. 新聞前哨. 2006 (10).

杜旌. 考評對組織承諾和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研究. 華中科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5.

高展軍、李垣. 組織慣例及其演進研究. 科研管理. 2007. 28 (3).

[美]蓋伊·塔奇曼著. 麻爭旗、劉笑盈、徐揚譯：做新聞. 華夏出版社. 2008. 原書：Tuchman, G., *Making news*, 1980.

[美]加里·戴斯勒著. 呂延傑、趙欣豔譯. 管理學精要 (第二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黎勇. “真實”掌握在記者手中——媒體內部考評機制與新聞失真. 青年記者. 2005 (1).

李金銓. 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 牛津大學出版社 (香港). 2004：61-93.

[美]李普曼著. 閻克文、江紅譯. 公眾輿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美]理查·R. 納爾遜、悉尼·G. 溫特著. 胡世凱譯：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 商務印書館. 1998. 原書：Nelson, R.R. & Winter, S.G.: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林淳華. 新聞記者工作自主權與決策參與權之研究. 新聞學研究 (臺灣). 1996 (52).

林富美. 聯合報系的薪酬策略. 新聞學研究 (臺灣). 1997 (54).

林富美. 藝人與經紀人派遣勞動關係初探. 新聞學研究 (臺灣). 2004 (78).

林富美. 當新聞記者成為名嘴. 名聲、專業與勞動商品化的探討. 新聞學研究 (臺灣). 2006 (88).

陸曄. 權力與新聞生產過程. 二十一世紀 (香港). 2005 (45). 2008年5月20日取自以下網址.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302037g.htm>.

陸曄、潘忠黨. 成名的想像. 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新聞從業者的專業主義. 新聞學研究 (臺灣). 2002 (71).

馬藝、殷莉. 建立新聞評價體系 完善品質考核標準. 新聞戰線. 2005 (3).

[美]馬克斯威爾著. 朱光明譯. 質的研究設計. 一種互動的取向. 重慶大學出版社. 2007.

劉冰、趙傑、胡凱. 為有源頭活水來——《楚天都市報》人事制度改革解讀. 新聞前哨. 2007 (1).

劉思達. 職業自主性與國家干預——西方職業社會學研究述評. 社會學研究. 2006 (1).

潘忠黨. 大陸新聞改革過程中象徵資源之替換形態. 新聞學研究 (臺灣). 1997 (54).

潘忠黨. 新聞改革與新聞體制的改造——我國新聞改革實踐的傳播社會學之探討. 新聞與傳播研究. 1997 (3).

潘忠黨. “補償網路”. 作為傳播社會學研究的觀念. 國際新聞界. 1997 (3).

潘忠黨、陳韜文. 中國改革過程中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評價和工作滿意度——兩個城市的新聞從業者問卷調查. 中國傳媒報告. 2005 (1). 2008年2月28日取自以下網址.

- 址.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2002>.
- [美]陶德·吉特林著. 張銳譯. 胡正榮校: 新左派運動的媒介鏡像. 華夏出版社. 2007. 原書: Gitlin.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The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
- 吳虹飛. 八卦公眾話語: 娛樂至死. 江蘇文藝出版社. 2008. 2009年5月20日取自新浪讀書頻道連載
<http://book.sina.com.cn/new/nzt/vip/59321/42322.html>.
- 肖燕雄. 微觀新聞制度論. 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2008. 189-235.
- 薛麗. 報業績效考核機制對新聞生產的影響——以《楚天金報》為例. 武漢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7.
- 王亞明. 創新機制激發活力提高效率——河南日報採編工作考核與獎懲機制解析. 新聞戰線. 2005(3).
- 尹連根. 關於南方日報採編系列分配機制改革的研究. 新聞界. 2002(6).
- 尹連根. 對績效考評導向功能的思考. 中國記者. 2003(9).
- 尹連根. 績效考評在報紙採編中的調控功能——以南方日報為研究個案. 新聞界. 2003(4).
- 尹連根. 對績效管理. 別太自信——《報業績效管理報告》後記. 新聞界. 2004(2).
- 禹建強. 報業績效考核的弊病與對策. 新聞記者. 2005(11).
- [英]詹姆斯卡倫著. 史安斌. 董關鵬譯. 媒體與權力.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5.
- 張文強. 媒介組織內部權力運做與新聞工作自主: 封建采邑內的權力控制與反抗. 新聞學研究(臺灣). 2002(73).
- 張文強. 新聞工作的常規樣貌. 平淡與熱情的對峙. 新聞學研究(臺灣). 2005(84).
- 張辛、李強. 記者“寫稿同盟”由來及對策. 青年記者. 2006(9).
- 張志安. 報導如何深入: 關於深度報導的精英訪談及經典案例. 南方日報出版社. 2006.
- 張志安. 編輯部場域的新聞生產. 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6.
- 張志安. 新聞生產與社會控制的張力呈現——對《南方都市報》深度報導的個案分析. 新聞與傳播評論(2007-2008年卷). 武漢出版社. 2008.
- Breed, W. (1955).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A functional analysis, *Social Forces*, 33(4), 326-335.
- Chan, J.M., Pan, Z. & Lee, F.L.F. (2004). & Francis L.F. Lee, Professional aspirations and job satisfaction: Chinese journalists at a time of change in the media,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1(2), 254-273.
- Feldman, M.S. & Pentland, B.T. (2003). Re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source of flexibility and chan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8, 94-118.
- Freidson, E. (2001). Professionalism The third logic.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6: 127-151.
- Pentland, B.T. & Rueter, H.H. (1994).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Grammers of ac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9, 484-510.
- Sigelman, L. (1973). Reporting the New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1), 132-151.
- Shoemaker, P. J. 著. 張詠華注釋. Gatekeeping 大眾傳媒把關 (中文注釋版).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07. 原書: Gatekeeping, 1996.
- Tuchman, G. (1972). Objectivity as strategic ritual: An examination of newsmen's notions of objectiv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4), 660-679.
- Tuchman, G. (1974).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1), 110-131.

作者資訊:

- 夏倩芳: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教授
尹瑛: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The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is an endeavour of LEWI to foster dialogues among institutions and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ast-West studies.

Circulation of this series is free of charge. Feedback should be addressed directly to authors. Abstracts of paper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LEWI web page (<http://www.hkbu.edu.hk/~lewi/publications.html>); full text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1. CHAN Kwok Bu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oth Sides, Now: A Sociologist Meditates on Culture Contact, Hybridiza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English/38 pages, April 2002.
2. Mary Ann GILLIE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East Meets West in the Poetry of T. S. Eliot*, English/30 pages, April 2002.
3. 湯一介 (北京大學), 文化的互動及其雙向選擇: 以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學傳入中國為例, 共 14 頁, 2002 年 7 月。
TANG Yijie (Peking University),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the Bidirectional Op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Indian Buddhism and Western Philosophy into China as Examples*, Chinese/14 pages, July 2002.
4. Werner MEISSNE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hina's Response to September 11 and its Changing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ish/15 pages, September 2002.
5. Janet Lee SCOT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Eastern Variations of Western Apprenticeship: The Paper Offerings Industry of Hong Kong*, English/30 pages, October 2002.
6. Alexius A. PEREIR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o-Singaporean Joint Ventures: The Case of th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Project*, English/32 pages, November 2002.
7. HO Wai Chu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 Study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English/27 pages, January 2003.
8. 樂黛雲 (北京大學), 多元文化與比較文學的發展, 共 11 頁, 2003 年 2 月。
YUE Daiyun (Peking University), *Plurality of Cultur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oward a New Perspective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11 pages, February 2003.
9. XIAO Xiaosu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New-Old Cycle Paradigm and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Radicalism*, English/37 pages, February 2003.
10. George Xun WAN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arkside), CHAN Kwok Bu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Vivienne LUK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onflict and its Management in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A Review*, English/34 pages, March 2003.
11. Charles MORRISON (East-West Center, University of Hawaii), *Globalization, Terrorism and the Future of East-West Studies*, English/20 pages, April 2003.
12. Ien ANG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Representing Social Life in a Conflictive Global World: From Diaspora to Hybridity*, English/13 pages, June 2003.

13. Renate KRIE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erderstr), *The Aspect of Gender in Cross-Cultural Management – Women’s Careers in Sino-German Joint Ventures*, English/23 Pages, June 2003.
14. Martha P. Y. CHEU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Representation, Mediation and Intervention: A Translation Anthologist’s Preliminary Reflections on Three Key Issues in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English/29 pages, October 2003.
15. Yingjin ZH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Transregional Imagination in Hong Kong Cinema: Questions of Culture, Identity, and Industry*, English/14 pages, November 2003.
16. Emilie Yueh-yu YEH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Elvis,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American Music and Neocolonialism in Taiwan Cinema*, English/29 pages, November 2003.
17. Tiziana LIOI (La Sapienza University, Rome), *T.S. Eliot in China: A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aste Land in Chinese*, English/29 pages, November 2003.
18. Jayne RODGERS (University of Leeds), *New Politics? Activ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English/17 pages, December 2003.
19. 鄭宏泰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黃紹倫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移民與本土：回歸前後香港華人身份認同問題的探討*, 共 35 頁, 2003 年 12 月。
Victor ZHE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WONG Siu-lun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mmigrant or Local: A Study on Hong Kong Chinese Identity after Handover*, Chinese/35 pages, December 2003.
20. ZHANG Longx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co Polo,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East-West Encounter*, English/23 pages, March 2004.
21. CHUNG Li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Pacific Rim Consciousness of American Writers in the West Coast*, English/18 pages, March 2004.
22. Dorothy Wai-sim LAU (Chu Hai College), *Between Personal Signature and Industrial Standards: John Woo as a Hong Kong Auteur in Hollywood*, English/27 pages, March 2004.
23. LO Kwai Cheu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Myth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 Ji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National” Literary Writing*, English/21 pages, April 2004.
24. Bradley R. BARNES (University of Leeds) and Qionglei YU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Cosmetic Advertising in China*, English/11 pages, May 2004.
25. Timothy Man-kong W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ocal Voluntarism: The Medical Mission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Hong Kong, 1842–1923*, English/36 pages, June 2004.
26. Ramona CUR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Bridging the Pacific with Love Eterne: Issues in Early Crossover Marketing of Hong Kong Cinema*, English/36 pages, June 2004.

27. Leo DOUW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Embedding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in China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o's in Control?* English/32 pages, July 2004.
28. WANG Wen (Lanzhou University) and TING Wai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eyond Identity? Theoretical Dilemma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ish/32 pages, August 2004.
29. CHAN Kwok Bu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Stranger's Plight, and Gift*, English/17 pages, September 2004.
30. Darrell William DAVI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aving Face: Spectator and Spectacle in Japanese Theatre and Film*, English/26 pages, October 2004.
31. CHAN Kwok Bu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Vivienne LUK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onflict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Change in Sino-Japanese, Sino-Korean, and Sino-Taiwanese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English/38 pages, November 2004.
32. Yingjin ZH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Styles, Subjects, and Special Points of View: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English/31 pages, December 2004.
33. Ashley TELLIS (Ea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yberpatriarchy: Chat Room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n-to-Man' Relations in Urban India*, English/14 pages, January 2005.
34. Koon-kwai W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Greening of the Chinese Mi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China'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nglish/21 pages, February 2005.
35. Jonathan E. ADLER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Open-mindedness, and Time*, English/17 pages, March 2005.
36. Georgette W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Emilie Yueh-yu YEH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Globalization and Hybridization in Cultural Production: A Tale of Two Films*, English/25 pages, April 2005.
37. Timothy Man-kong W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Printing, Evangelism, and Sinology: A Historical Appraisal of the Sinological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South China*, English/28 pages, May 2005.
38. Hanneke TEEKENS (Netherlands Organiz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NUFFIC), *East West: at Home the Best?* English/19 pages, June 2005.
39. Yinbing LEU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Action Plan to Raise Language Standards": A Response to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English/28 pages, July 2005.
40. 陳國貴(香港浸會大學)、黎熙元(廣州中山大學)、陸何慧薇(香港浸會大學), *中國“三資”企業中的文化衝突與文化創新*, 共 19 頁, 2005 年 7 月。
 CHAN Kwok-bu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 Xiyua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Vivienne LUK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Cultural Conflict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of Sino-foreign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Chinese/19 pages, July 2005.

41. CHAN Kwok-bu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Odalia M.H. W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Private and Public: Gender, Generation and Family Life in Flux*, English/21 pages, August 2005.
42. LEUNG Hon Chu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Globalization, Modernity, and Careers at Work: Life Politics of Woman Workers in Hongkong-Shenzhen*, English/14 pages, August 2005.
43. CHAN Kwok-bu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osmopolitan, Translated Man, or Stranger? Experimenting with Sociological Autobiography*, English/33 pages, September 2005.
44. CHUNG Po Yi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Moguls of the Chinese Cinema – the Story of the Shaw Brothers in Shanghai,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1924-2002*, English/18 pages, October 2005.
45. Vivian C. SHEER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CHEN Li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Construction of Fear Appeals in Chinese Print OTC Ads: Extending the Four-Component Message Structure*, English/29 pages, November 2005.
46. 何平 (四川大學)、陳國貴 (香港浸會大學), 中外思想中的文化“雜交”觀念, 共 25 頁, 2005 年 12 月。
HE Ping (Sichuan University) and CHAN Kwok-bu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ybridity: Concepts and Realities in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25 pages, December 2005.
47. Emilie Yueh-yu YEH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nnovation or Recycling? Mandarin Classics and the Return of the Wenyi Tradition*, English/22 pages, January 2006.
48. CHAN Kwok-bu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Leo DOUW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Differences, Conflicts and Innovations: An Emergent Transnational Management Culture in China*, English/25 pages, February 2006.
49. Eugene EOYANG (Lingnan University), *Of “Invincible Spears and Impenetrable Shield”: The Possibility of Impossible Translations*, English/10 pages, March 2006.
50. Thomas Y. T. LU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daptations and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Drama: A Socio-cultural Study of Hong Kong Repertory Company’s Past Practices*, English/14 pages, April 2006.
51. CHEN Li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 Orientations as Indigenous Constructs: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English/21 pages, May 2006.
52. Paul HOCKINGS (United International Colleg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Gaoqiao, a Second Look at a Well-Studied Yunnan Village*, English/13pages, June 2006.
53. Janet SALAFF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Arent GREVE (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From Professional to Family Careers*, English/38 pages, July 2006.

54. 張美蘭 (清華大學), 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對十九世紀末漢語官話研究的貢獻:《官話類編》
專題研究, 共 47 頁, 2006 年 8 月。
ZHANG Meilan (Tsinghua University), *A Study on Calvin Wilson Mateer's 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Contributions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to the Study of Mandarin
Chines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Chinese/47 pages, August 2006.
55. CHAN Kwok-bu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 and
Hybridization: Their Impact on Our Lives*, English/22 pages, September 2006.
56. Emilie Yueh-yu YEH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Incriminating Spaces: Border
Politics of Mukokuseki Asia*, English/19 pages, October 2006.
57. Brenda ALMOND (University of Hull), *Conflicting Ideologies of the Family: Is the Family
Just a Social Construct?* English/20 pages, November 2006.
58. Brenda ALMOND (University of Hull), *Social Policy, Law and the Contemporary Family*,
English/32 pages, December 2006.
59. Brenda ALMOND (University of Hull), *Analysing and Resolving Values Conflict*,
English/18 pages, January 2007.
60. Peter NEWELL (Global Initiative to End All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The
Immediate Human Rights Imperative to Prohibit All Corpor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English/16 pages, February 2007.
61. Pablo Sze-pang TSOI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oyce and China: A Mode of
Intertextuality – The Legitimacy of Reading and Translating Joyce*, English/24 pages,
March 2007.
62. Janet SALAFF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gela SHIK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Arent
GREVE (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ike Sons and
Daughters of Hong Kong: The Return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English/34 pages, April
2007.
63. Stephen Yiu-wai CHU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Fall: Mapping
Hong Kong Cantopop in the Global Era*, English/21 pages, May 2007.
64. 許維賢 (北京大學), 黑騎士的戀物/(歷史)唯物癖: 董啟章論, 共 43 頁, 2007 年 6
月。
HEE Wai Siam (Peking University), *Fetishism 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Black Rider: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Works of Dung Kai-cheung*, Chinese/43 pages, June 2007.
65. 葉智仁 (西門菲沙大學), 全球消費主義與倫理營銷: 耶、儒思想的初步回應, 共 20 頁,
2007 年 7 月。
Toby YIP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Global Consumerism and Ethical Marketing: Initial
Responses from Christianity & Confucianism*, Chinese/20 pages, July 2007.
66. Yiu Fai CHOW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Fear or Fearless: Martial Arts Films and
Dutch-Chinese Masculinities*, English/34 pages, August 2007.
67. CHEN Xiangyang (New York University), *Technologizing the Vernacular: Cantonese Opera
Films through the Legend of Purple Hairpin*, English/32 pages, September 2007.

68. YAN Feng (Fudan University), *Metamorphosis and Mediality: An Interart Approach to the Reception of Stephen Chow's A Chinese Odyssey in Mainland China*, English/14 pages, October 2007.
69. Emilie Yueh-yu YEH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WANG Hu (Phoenix Television), *Transcultural Sounds: Music, Identity and the Cinema of Wong Kar-wai*, English/16 pages, November 2007.
70. 龍明慧 (中山大學), 原型理論下的中西翻譯認知, 共 15 頁, 2007 年 12 月。
LONG Minghui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ototype-Based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Chinese/15 pages, December 2007.
71. 梁婷婷 (四川大學), 「被全球化」的城市 —— 1990 年代末以來成都市城市形象廣告片的社會背景與自我表徵, 共 18 頁, 2008 年 1 月。
LIANG Tingting (Sichuan University), *The Globalized City: Social Background and Self-Representation of City Promotional Videos of Chengdu – 1999 to 2006*, Chinese/18 pages, January 2008.
72. 沈本秋 (復旦大學), 香港的國際政治經濟「二元特徵」與美國的香港政策, 共 36 頁, 2008 年 2 月。
SHEN Benqiu (Fudan University), *The Dualistic Structure of Hong Kong's Political Economy and U.S. – Hong Kong Policy*, Chinese/36 pages, February 2008.
73. 汪暉 (清華大學), 去政治化的政治與中國的短二十世紀的終結, 共 51 頁, 2008 年 3 月。
WANG Hui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ing Politics and the End of China's 20th Century*, Chinese/36 pages, March 2008.
74. Emilie Yueh-yu YEH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Neda Hei-tung 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Magic, Medicine, Cannibalism: the China Demon in Hong Kong Horror*, English/22 pages, April 2008.
75. Flora C. J. HU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ultural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Cultivation Strategie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English/30 pages, May 2008.
76. Cynthia F. K. LE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Some Insights on Essential Elements and Barriers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in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English/15 pages, June 2008.
77. HO Wai Chu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 Review of Moral Education in China's Music Education*, English/23 pages, July 2008.
78. LAU Patrick W. C.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Michael H. S. LA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Beeto W. C. LEU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Beijing Olympics: School Children's Responses in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English/25 pages, August 2008.
79. 陳秀鶯 (華南理工大學), 高新技術中小企業關係質量的因因關係研究, 共 32 頁, 2008 年 9 月。
CHEN Xiuyi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 Study on High-tech SMEs Relationship Marketing Research in China*, Chinese/32 pages, September 2008.

80. CHEN Yi-Ru Regina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MNC-Government Relations and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MNCs in China's Era of Marketization*, English/27pages, October 2008.
81. David Francis URROW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Pipe Organ and the Jesuits in China: A Brief Survey*, English/22pages, November 2008.
82. 郭中實 (香港浸會大學),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 杜耀明 (香港浸會大學), 陳芳怡 (香港浸會大學), 「香港新聞媒介表現」研究, 共 17 頁, 2008 年 12 月。
Steve GUO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UANG Yu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O Yiu Mi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Fanny CHA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News Media Performance Study*, Chinese/17 pages, December 2008.
83. Emilie Yueh-yu YEH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ross-cultural Analysis: Wenyi (文藝) and Melodrama*, English/19 pages, January 2009.
84. 譚小琴 (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牛津大學的技術轉移模式比較研究, 共 38 頁, 2009 年 2 月。
TAN Xiaoqin (Tsinghua Universi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Models in Tsinghua Universit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Oxford University*, Chinese/38 pages, February 2009.
85. Hao-Chieh CHA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ommitment for Life and Beyond*": *Persuasive Discourses Employed in a Body Donation Campaign in Taiwan*, English/25 pages, March 2009.
86. CHEN Li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ultural Identity as a Production in Process: Dialectics in Hongkongers' Account*, English/26 pages, April 2009.
87. LIU Yigong (Lanzhou University), *Chinese Legal Tradition and its Modernization*, English/13pages, May 2009.
88. 夏倩芳 (武漢大學), 尹瑛 (武漢大學), 大陸媒體績效考核制度下新聞專業主義的實踐邏輯: 國家 -- 市場之外的視角, 共 36 頁, 2009 年 6 月。
XIA Qianfang (Wuhan University) and YIN Ying (Wuhan University), *The Logic of Discursive Professionalism in the Performance Review of Chinese Medi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s beyond the State and Market*, Chinese/36 pages, June 2009.
89. David Cheunyan LAI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hinatowns: from Slums to Tourist Destinations*, English/21 pages, July 2009.
90. Linjuan Rita ME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nd Chun-ju Flora HU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Exploring the Value of Organization-public Relationship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From a Resource-based View*, English/34 pages, August 2009.

Submission of Papers

Scholars in East-West studies who are interested in submitting a paper for publication should send article manuscript, preferably in a WORD file via e-mail, to the Series Secretary's email address at lewi@hkbu.edu.hk or by post to 9/F., David C. Lam Buildi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Kowloon Tong, Hong Kong. Preferred type is Times New Romans, not less than 11 point.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will review all submissions and the Institute reserves the right not to publish particular manuscripts submitted. Authors should hear from the Series Secretary about the review normally within one month after submission.